

“新中国”的叛逃者

——韩战反共战俘的生死逃亡路, 1950-1954 *

常成

摘要: 韩战延续三年, 其中两年双方边打边谈。自 1952 年初起, 中国战俘遣返问题成为停战谈判的核心争议。美国坚持“志愿遣返”原则, 允许部分战俘不返回中国大陆, 而中共坚决反对, 因此战争又延续了约一年半。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叛逃者为核心的反共战俘较早地控制了两大中国战俘营, 对其他战俘实施严密的人身控制、暴力胁迫与思想灌输, 以致大多数战俘在 1952 年 4 至 5 月的“甄别”过程中表示反对遣返。本文梳理五名反共战俘领袖的叛逃过程, 分析他们在国共两党统治下的异同经历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 他们的叛逃对战役、战争与战俘营斗争所产生的影响; 最后探讨在“强制参与、无退出机制”的制度之下, 个人表达真实“志愿”的可能性。本文的主要材料包括美军审讯纪录、美国 and 台湾军事外交档案、战俘回忆录、个人档案以及口述历史访问。

* 本文在研究期间, 曾获 Fulbright 学术交流基金会、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汉学研究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RGC-ECS 659913)之奖助。蒙王鼎钧、陈永发、余敏玲、罗久蓉教授, 以及《汉学研究》两位匿名审查人诸多指教, 受惠良多, 揣此一并申谢。本文中, 韩战即朝鲜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 朝鲜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北韩), 韩国指大韩国(南韩、南朝鲜)。本文曾刊于《汉学研究》第 34 卷第 2 期(2016 年 6 月)。感谢《汉学研究》同意修订再版。

序 言

1954年1月20日早上8时52分,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列队走出位于韩国北纬38度线上板门店的中立区。他们高举孙中山与蒋介石的画像,挥舞青天白日旗,三年的战俘营生活终于结束了。直至次日凌晨2点45分,共有约14,220名中国战俘撤出中立区。依照《朝鲜停战协定》受“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任命的印度看管部队将这些“拒绝遣返”的中国战俘和约7,600名的朝鲜人民军战俘交还给联合国军(以下简称联军)总部,联军随即又将中朝战俘分别移交给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与韩国的李承晚政府。1月22日是《停战协定》所规定的中立国管辖战俘的最后期限;23日零时1分联军总部不顾中朝方面的反对,正式宣布释放战俘,恢复其平民身分。而此时,14,078名中国战俘已经在两天前登上15艘美军登陆舰,正在驶往台湾基隆途中;142名伤病战俘于23日分乘6架运输机飞往台北¹。到是年6月为止,先后抵达台湾的中国籍战俘总数达到14,342名²。中华民国政府称他们为“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并宣布每年的1月23日为“一二三自由日”。

而遣返中国大陆的战俘总计7,110人,其中包括在1953年4月“小交换”中遣返的1,030名伤病者,8、9月的“大交换”中遣返的5,640人,以及440人在1953年9至12月的“解释”期间和1954年1月脱离中立区的反共战俘营(其中通过听“解释”选择回国的只有90人,其余350人通过求助印度部队或翻越铁丝网等方式逃离)。另外,程立人等12名中国战俘寻求中立国庇护,于2月初随印军前往印度,等待其他中立国接

1 赖名汤《接运留韩中国反共义士归国联络小组工作报告书》,周琇环编《战后外交史料汇编——韩战与反共义士篇(一)》,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336、339-340、341-342、384页。

2 蒋经国《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工作总报告》,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档案,1954年6月,档号0001238900090047w。

收³。

韩战延续三年,其中两年时间双方边打边谈。停战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议的核心原因是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中共坚持遣返全部或绝大多数中国战俘,而美国坚持“志愿遣返”的原则,允许战俘不返回中国大陆。双方就此进行了近两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最终结果是三分之二(66.8%)的中国战俘去到台湾,而只有三分之一(33.1%)回到中国大陆。

“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除了台南籍的陈永华和澎湖籍的王瀛昌,全部都是大陆籍,绝大多数从未到过台湾。为什么大多数中国战俘“选择”台湾而拒绝返回家乡呢?

笔者查阅大量美国和台湾多个档案馆的军事与外交档案,访问八十余名海峡两岸以及之后从台湾移居美国的前战俘,参考两岸战俘的回忆录及相关文献,确定少数反共战俘对其他战俘的影响、控制、甚至胁迫是大多数战俘“选择”到台湾的重要原因。在联军战俘营当局的支持或默许下,以志愿军叛逃者为核心的反共战俘及早控制了两大中国战俘营,实施严密的人身控制、暴力胁迫与反共思想灌输。1952年4至5月战俘营当局对战俘的遣返意愿进行“甄别”,结果大多数中国战俘表达的意向与其所在战俘营领导者的意志一致。在反共战俘控制的两大战俘营(第72和第86号),拒绝遣返者占绝大多数,超过14,000人。而在由中共战俘控制的一个小战俘营,全部二百多名战俘都要求遣返回大陆。要求遣返者总数至4月中旬仅有5,100人,至6月微增至6,388人⁴。中共断然拒绝接受如此悬殊的甄别结果。韩战后半段的核心争议正是关于此14,000余名拒绝遣返的中国籍反共战俘,他们的选择使得战争多打

3 Walter G. Hermes, *Truce Tent and Fighting Front: U.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S. Army, 2005), p. 515. “解释”归来的人数,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报告》(联合国文件 A/2641),纽约:联合国,1954年,第108、119、163页。

4 Hermes, *Truce Tent and Fighting Front*, pp. 171, 270.

了一年多。

每个战俘的“甄别”意向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诸如个人的政治经历与理念、对台湾未来命运的判断、战俘营内的暴力胁迫和惩戒威胁程度等,而各战俘营领导者的控制具有最重大的影响⁵。因此,理解 21,000 余名中国战俘思想行为的关键在于理解战俘营领导者。而要理解他们为何、如何成为领导者,就需要考察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下的经历,并且分析其经历如何形塑其政治立场、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

本文的材料来自意识形态对立的战俘群体,双方的叙述往往带有特定的倾向性。为比较平衡客观地接近史实,本文综合利用亲共、反共双方战俘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回忆录、口述访问和审讯纪录,美国和台湾的外交、军事档案以及联合国报告等,进行交叉排比对照,以求相互印证。本文的重要史实都得到不同来源、不同倾向的多重史料的证实。当然,也有部分细节描述来自当事人回忆录或口述,无从完全印证,但是笔者判断其内容重要并且基本合理。对于史料中的矛盾和疑点,文中也将有所分析探讨。

本文叙述五名反共战俘领袖在韩战战场叛逃、在战俘营崛起、衰落或消失的过程。当他们做出叛逃这一生死攸关的决定并付诸行动的时候,他们的确冒死以求脱离中共统治的一线生机。他们战场叛逃成功了,但肯定有更多的叛逃者失败,被抓获、处决或失踪。这些“新中国的叛逃者”向联军投诚,经历九死一生,他们绝不愿意被遣返回大陆。他们的生死逃亡也预示着战俘营的斗争必定是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

他们从“强制参与、无退出机制”的“新中国”叛逃,却又在联军战俘营建立起一套相似的制度,“用共产党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强迫中共团员和普通战俘参与反共活动,而拒绝服从的战俘只能通过冒险翻越

5 关于此一问题的具体论证超出本文的范围,笔者有专书讨论,见 David Cheng Chang, *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铁丝网等极端方式逃离,或通过战俘营当局干预等特殊情况下方得脱离。本文最后探讨在“强制参与、无退出机制”的制度之下,个人表达真实“志愿”的可能性。

五名反共战俘领袖的生死逃亡路

这五名反共战俘领袖包括曾管理过七、八千名战俘的第 72 号战俘营联队长王顺清、副联队长的李大安(人称“活阎王”),先后任第 86 号战俘营联队长的王福田和王尊铭,以及曾任军官战俘队长的刘炳璋。“三王”顺利抵达台湾,而刘、李二人则被美军情报机关征用,前往朝鲜敌后搜集情报,刘神秘身亡,李被俘后于 1958 年在北京被枪决。以下按中共发动的五次大战役的顺序,描述分析他们的叛逃过程与后续发展。

1. 第一次战役(1950.10.25-11.5)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上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40 军在朝鲜西北部云山地区伏击正在向鸭绿江开进的韩国第一师和第六师;同日,志愿军第 42 军在东北部的长津湖以南的黄草岭阻击北进的韩国第三师。“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打响,标志着中共军队正式介入韩战。而十天前的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还信誓旦旦地向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 1884-1972)保证中共参战的可能性“极小”⁶。

美军遭受伏击、攻势受挫之后依然认为中共并未大规模出兵,尽管多名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报告清楚说明中共第 13 兵团下属各军已经入朝。自 10 月 25 日白善焯将军的韩国第一师在云山俘虏了韩战第一名中国战俘之后,陆续有更多的志愿军被俘或投诚。至 29 日,西线战场的

6 Roy E.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June-November 1950)*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61), p. 760.

美第八集团军共俘获 10 名中国战俘⁷。而东线战场的美第十军于 29 日一天就抓获 16 名中国战俘⁸。次日,同时兼任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长和第十军司令的阿尔蒙德(Edward Almond)亲自审讯这 16 名战俘后,认为这些“华人洗衣工”(Chinese laundrymen)“不大聪明”⁹。美军将领和情报官员对他们的供词深表怀疑,不予采信;反而坚持认为他们是中共小股部队的“掉队者”或原中共部队的朝鲜籍“志愿者”。到 10 月底,第八集团军依然研判“没有中共公开干涉的迹象”或“无证据可确认成建制的中共部队已入朝”¹⁰。

事实上,联军所面对的不是种族主义幻想中孱弱的“华人洗衣工”或散兵游勇,而是中共最精锐的第四野战军——在刚结束的国共内战中所向披靡,从东北打到海南的原林彪部队。10 月 19 日晚,志愿军第 13 兵团第 40、第 39、第 42 军大规模地从安东、长甸、辑安三个口岸跨过鸭绿江;第 38 军紧随其后。而且,在此前三天,作为侦察部队的第 42 军 124 师 370 团已经从辑安入朝¹¹。被阿尔蒙德亲自审讯并贬为“华人洗衣工”的 16 名战俘恰恰来自该团。而未来的反共战俘领袖王福田来自第 372 团,他在第一次战役中投诚美军,成为最早的一百名中国战俘之一。

王福田:最早的一百名中国战俘之一

单位与职务:第 42 军 124 师 372 团 2 营 5 连 4 排 2 班 战士

叛逃或被俘日期:1950 年 11 月 7 日前后

7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p. 751.

8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p. 687.

9 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Hyperion, 2007), pp. 431-432, 439. Halberstam 认为这种盲目自大的心态源于美军将领的种族主义思想。

10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pp. 752-753.

1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26-329 页。

多份美军审讯报告记载王福田于10月8日在长津湖西南约20公里的黄草岭被美军俘虏,而第124师早在9月15日就从辑安入朝¹²。该纪录肯定是错误的。9月15日美军才在仁川登陆,朝鲜军队尚未溃败,金日成不可能在此时让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直到联军收复汉城之后,10月1日金日成才首次向中共求援。10月7日美第八集团军跨过38度线向朝鲜西北部进击。而负责攻占朝鲜东北部的美第十军所属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从仁川上船,绕过大半个朝鲜半岛,迟至10月26日才在元山登陆,11月2日首次与志愿军第124师接触,随后在兴南通往长津湖的峡谷中激战六日,艰难缓慢地推进。第124师遭受重创后于7日撤退,与美军脱离接触。据美军史记载,第372团的Wang Fu Tien在战斗最后阶段被俘¹³。此人就是王福田,其被俘时间大约是11月7日。

美军史称王福田为俘虏(prisoner),审讯报告称其“被俘”(captured),都未使用“逃兵”(deserter)一词。这位未来的反共战俘领袖在战场上是主动投诚还是被俘呢?由于美军很难辨别在战斗中投降的敌军士兵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一般把所有战场俘虏都纪录为“被俘”。“逃兵”一般用来描述那些脱离原部队,藏匿起来伺机投降或穿越防线前来投诚的敌军官兵。王福田虽然不是逃兵,也属主动投降。1951年1月,王福田在审讯中解释投降动机:以他在抗战中参加中美合作训练班时对美国人的了解,他相信美军会善待俘虏。他还要求美军送他去台湾加入蒋介石的军队¹⁴。1953年,美国社会科学家在济州岛战俘营访问

12 王福田(Wang Fu Tien), ATIS 审讯报告 4614, 1950 年 12 月 28 日, 第 1-2 页; ATIS 审讯报告 4016, 1951 年 3 月 5 日, 第 35 页。审讯报告属美军内部情报, 美政府亦未用其作宣传, 应无造假的动机。审讯纪录所记日期虽时有不准确之处, 但所述事件通常可被证实。ATIS 审讯报告即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 Interrogation Reports,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RG554, 美国国家档案馆。

13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pp. 729, 743.

14 王福田(Wang Fu Tien), ATIS 审讯报告 3022, 1951 年 1 月 26 日, 第 61 页。

王福田,这位“身材高大、性格刚烈”的战俘领袖声称自己曾三次试图叛逃,直到1950年11月才成功¹⁵。很明显,王福田一直渴望逃离,却苦于没有机会,直到黄草岭之战共军受创撤退,他终于乘机向联军投降,成为韩战最早的一百名中国战俘之一¹⁶。

时年32岁的王福田于1918年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泛水村,只读过一两年小学¹⁷。按照中共的阶级理论,他应该算是工农阶级出身。不过,以中共阶级成分划分的实际经验,这个后来抵制中共思想改造的国军老兵却可能被定性为“兵痞”。1932年,年仅14岁的王福田到沈阳的日军军械厂做过七个月的学徒。抗战爆发后,1938年6月王在绥远(今内蒙中部)参加傅作义的第35军新编第31师输送营,任传令兵¹⁸。后转入中央骑兵团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的中美训练班受训,其后加入“中美训练班别动军”与日军作战¹⁹。抗战胜利后,王的单位改编为戴笠属下的“交通警察部队”,负责保卫包头至北平的铁路线。1948年12月平津会战期间,王在北平西北的沙河被解放军第42军俘虏。三个月的思想改造结束后,王随部队南下,征战保定、郑州和安阳,并于1949底

15 这些社会科学家是受到隶属于美国国防部“人力资源研究办公室”(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ffice (HumRRO))委托到韩国战俘营研究共产党士兵的集体行为特征。William C. Bradbury, Samuel M. Meyers, and Albert D. Biderman, *Mass Behavior in Battle and Captivity: The Communist Soldier in the Korean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 xx, 48. 该书中对“老士官 Fu”的描述和王福田的审讯报告高度吻合,可确定 Fu 即王福田。

16 Bradbury, *Mass Behavior*, p. 48.

17 除非特别注明,以下所述的王福田经历都来自上述的两份审讯报告(4016、4614)以及 Bradbury, *Mass Behavior*, pp. 48-53。不同资料显示王的教育程度为一至三年小学。

18 此日期根据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呈外交部《韩国济州岛摩瑟浦战俘营反共义士第一、二、三联队等小队队长阶级以上人员名单》,《在韩中共俘虏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国际组织司档案,档号 633.43/0005。

19 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设在绥远陕坝,第一期抽调骑兵师一个团,第二期抽调傅作义部队一个团。见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上)》,《传记文学》54.5(1989年5月),第98页。

西进至川东达县。

王福田于 1948 年底被中共俘虏时,已经在国军服役十年,大概是受限于教育程度,他的最高军衔只是士官长。被俘后他被降级为普通战士,主要从事搬运等体力重活。与第三章中提到的其他前国军士兵一样,性格刚烈的王对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深恶痛绝,时常忍不住顶撞中共干部。当连指导员讲课宣称八年抗战都是八路军的功劳,而国民党毫无贡献时,王对中共“颠倒黑白”愤愤不已,起身反驳:“共产党还有没有良心?抗战时期的八大战区,有哪一个战区的司令长官是共产党?”为此,王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关了一周禁闭。王曾两次逃跑,皆告失败。其中一次王被地方政府抓获送回团部,在大会上被批斗。虽然他从未目睹过公开枪决行刑,但他经常做噩梦²⁰。

1950 年夏第 124 师移师东北,在吉林通化整训。韩战爆发后不久,部队开始反美动员。排长告诉大家美军是“纸老虎”,并不可怕,王反问道:“那怎么说我们解放不了台湾就是因为美国第七舰队的阻挠呢?”结果王被定为特务嫌疑,被关押 27 天,直到部队要开拔入朝才获释²¹。志愿军干部为了提高士气,宣称蒋介石派兵三万三千人来韩参战,而这些中共过去的手下败兵是不堪一击的。王福田心中窃喜,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想,“也许我可以遇到国军²²。”不久他就在黄草岭阻击战中如愿向美军投诚。

尽管王福田的教育程度很低,但他善于观察,长于表达,因此美军对他多次审查,调查他的个人及部队历史,并记录他对各地政治、经济、社会、交通以及民生等各方面的观察。在审查中王多次表达强烈的反苏反共思想:他谴责苏军强暴中国妇女,劫掠东北资源;他抨击中共在八年抗战后破坏得来不易的和平,挑起内战。在美国社会学家面前,王福田对

20 Bradbury, *Mass Behavior*, 51.

21 Bradbury, *Mass Behavior*, 52.

22 Bradbury, *Mass Behavior*, 52-53.

共军生活的描述颇具哲思：“我们都和木偶一样：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有嘴巴，却不能说²³。”中共对王福田的思想改造显然失败了，反而使他成为更坚定、更善辩的反共分子。

在战俘营，王福田迅速成为反共战俘领袖，任大队长等职，还曾短期担任第 86 战俘营联队长。1954 年 1 月到台湾后王被核为少校；4 月被授予六等云麾勋章，表彰其“捍卫国家或镇慑内乱建有战功”。蒋经国领导的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编写《反共义士请勋奖建议册》，列举王福田“功绩事实”：

一、最早投奔联军，誓决不返匪区，并在联军广播(劝)匪军投诚。二、发起反共组织，打死匪特分子多人，使大家安全。三、诚心待人、处事公平、廉洁领导、达成回国志愿²⁴。

1954 年 9 月，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访台，王福田等 30 位“反共义士”代表前往拜谒²⁵。1955 年王应美国新闻处之邀赴泰国作巡回演讲，为期三个月，听众累计十万人之众。美新处致函台湾外交部，称赞“王少校以其个人经历，对共产主义作深刻真实之剖析，使人无懈可击，……已使泰人对共产主义之恐怖生活留下深刻印象²⁶。”在反共宣传价值甚高的 1950 年代，只读过一两年小学却口才辩给的王福田成为演说家。后王被调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从事大陆情报研究与心战工作²⁷。

23 Bradbury, *Mass Behavior*, p. 51.

24 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辅导总队有功义士请奖名册》，国防部档案，1954 年 4 月，档号 0001671600020062w、0001671500050141w。《军职勋章》，见总统府网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81> (2012 年 11 月 9 日上网检索)。

25 《泰勒昨接见反共义士》(《联合报》(第 3 版)，1954 年 9 月 30 日。

26 周琇环编《战后外交史料汇编——韩战与反共义士篇(三)》，第 270 页。

27 高文俊口述，常成电话访问，2015 年 8 月 12 日。

2. 第二次战役(1950.11.25-12.24)

第一次战役于11月5日顺利结束后,志愿军收缩撤退,制造零星参战、怯战败退的假象。次日联军就恢复试探性进攻,准备沿交通线继续北进。24日上午,麦克阿瑟从东京飞抵朝鲜前线,命令展开“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他宣称:“胜局已定,中国人不会参战。联军两周内打到鸭绿江就可以回国了,我要让大兵们回家吃上圣诞晚餐”²⁸。而志愿军继续诱敌至预定战场。25日傍晚,志愿军在西线战场发起第二次战役,在清川江以东大规模袭击第八集团军属下第九军;次日在清川江以西攻击第一军;27日在东线战场长津湖围攻第十军。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几无还手之力,29日开始全面退却,南撤途中又遭到强力伏击,伤亡惨重。西线的第八集团军陷入恐慌,指挥混乱,斗志全无。“这是美军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遭受重创的美第二师第23团团长沙罗·弗里曼(Paul L. Freeman)痛陈,“整个集团军的士兵只顾逃命,遗弃伤员”²⁹。联军和共军脱离接触后,依旧望风而逃。12月5日第八集团军弃守平壤,到16日已经全线撤退到三八线以南,距第二次战役或“圣诞节回家攻势”开始时的战线后撤了约200公里³⁰。

麦克阿瑟曾于10月15日在威克岛向杜鲁门总统夸口:“假如中共试图南下平壤,将面对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³¹。而12月6日共军兵不血刃收复平壤。此次战役惨遭屠杀的却是联军:东线的美第十军和西线清川江以东的第九军受到重创,其中第二步兵师伤亡4,940人,韩军第七、第八师被歼灭。仅有最西线的清川江以西的第一军(含美第24师、韩第1师及英军第27旅)全身而退³²。第二次战役在中共军史上被颂

28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p. 388; Clay Blair, *The Forgotte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433.

29 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pp. 194, 196.

3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540-543页。

31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p. 760.

32 Mossman, *Ebb and Flow*, pp. 127, 149.

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对美军打击最为严厉，……运动战阶段打得最为精彩”的战役³³。对美国人来说，这次战败却是奇耻大辱。艾奇逊称其为“美军历史上自〔美国内战期间的〕牛奔河(Bull Run)战役以来最惨重的失败”³⁴。

然而，志愿军在这场完胜中却有多名士兵叛逃。他们利用 11 月 24 日联军发动攻势至 25、26 日志愿军发起攻势之间的一两天空隙，乘志愿军“运动防御”之机，穿过双方犬牙交错的战线向联军投诚。24 日傍晚，第 40 军一名 24 岁的卫生员王顺清带领四名志愿军战士和三名美军战俘投向美军。25 日凌晨六点，第 66 军一名 26 岁的连级教育参谋刘炳璋叛逃。26 日上午 8 点，最西线第 50 军一名 30 岁的挑夫齐振武乘移防之机，扔下背负的弹药给养，向美第 24 师投诚。齐振武就是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讲述的那位被迫“自愿”参军的堂兄³⁵。此三人是幸运的，他们叛逃的时机都是在志愿军发起攻势之前一天或半天，美军尚未遭遇伏击。他们投诚后向联军提供的情报或许促使第一军决定停止前进并开始撤退，数以千计的美国、英国、韩国和土耳其士兵也许因此保住了性命。在战俘营中，齐振武默默无闻，而王顺清和刘炳璋则成为反共战俘领袖。

(1)王顺清：未来的反共战俘头号领袖

单位与职务：第 40 军 118 师 354 团 1 营 卫生员

叛逃日期：1950 年 11 月 24 日

王顺清大概是最重要的反共战俘领袖，却神秘低调，到台后政府未

3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547 页。

34 Truman and Acheson, *Affection and Trust*, 115. 1861 年的牛奔河战役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大战，南军大败北军。

35 齐振武(Chi Chen Wu), ATIS 审讯报告 2851, 1950 年 11 月 27 日, 第 4 页; 审讯报告 2776, 1950 年 11 月 29 日, 第 90 页; 齐邦媛《巨流河》, 台北: 远见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2009 年, 第 563-564 页。

对他做任何宣传。中共所掌握的情况完全来自遣返战俘的道听涂说,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甚至称王曾任国军营长,被解放军俘虏后隐瞒身分,在第 38 军任卫生员,而其他经历付诸阙如³⁶。所幸美军审讯报告简要记录其战前经历。关于其战俘营经历,曾在王身边担任警备队班长的萧力行口述访问提供不少重要讯息。

美军审讯报告显示王顺清原职业为教师,后加入国军第 63 军,但未记录其职务。据台湾方面于 1953 年 9 月秘密获得的反共战俘干部名单,王顺清的原单位为国军第 63 军 321 师 963 团 2 营 4 连,亦未记其职务³⁷。据萧力行称王曾任副连长³⁸。1950 年 6 月 7 日王在海南岛被中共俘获³⁹。随后他被编入第 40 军第 354 团任卫生员。9 月该军北上安东,10 月 19 日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新义州,昼伏夜行沿小路南进。11 月 24 日,美军发起攻势,该团首次与联军接触交战,当天傍晚王顺清就向美军投诚,随后被送往平壤审讯。审讯报告如是描述其投诚过程:

11 月 24 日,第 40 军 354 团一营与美军在某地交战。该战俘是卫生员,被留下照顾被俘的三名美国士兵(其中两人受伤)……该战俘决定叛逃,他带着四名中共士兵(他们都不知道这名战俘的投诚意图)和三名受伤的美国士兵,穿过中共军队的战线,于 17 时向

36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第 462 页;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年,第 289 页。

37 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呈外交部《韩国济州岛摩瑟浦战俘营反共义士第一、二、三联队等小队长阶级以上人员名单》,《在韩中共俘虏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国际组司档案,档号 633.43/0005。

38 马国正访问《萧力行先生访问纪录》,周琇环、张世英、马国正《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台北:国史馆,2013 年,第 428 页。

39 王顺清(Wong Shun Ching), ATIS 审讯报告 164-MISDI-1276,1950 年 12 月 1 日,第 1 页。5 月 1 日中共第 40、第 43 军占领海南全岛。王顺清被俘的日期可能有误;或者他藏匿一段时间后才于 6 月被俘。

美军某部投降⁴⁰。

被王顺清所营救的三名美军俘虏要求美军“尽可能地优待王，以感谢他的服务”。而且王披着一条获救美军俘虏赠送的围巾⁴¹。最不可思议的是王居然能够蒙骗其他四名志愿军士兵，一同把美军战俘送回联军阵地。毫无疑问，24岁的王顺清具有超常的领导才能。

同样不同寻常的是王顺清的英语水准。审讯纪录显示：“该战俘英语讲得不错，部分审查用英语进行”。这显然是他在青岛所受12年完整教育的结果。不过，王在海南岛被中共俘虏后，他“隐瞒了自己的英语能力，因此没有被分配到需要使用英语的单位”。王顺清很可能还隐瞒了军阶，编造了简历。他被编入解放军任卫生员，因此躲过了被俘军官都要经历的高强度思想改造。中共完全低估了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俘虏。

王顺清向美军投诚后随即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坚决反共。王称他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在1948年的土改中被中共杀害⁴²。依此推断王很可能来自山东的地主家庭。从1950年6月初被中共俘虏至11月底向联军投降，王顺清在中共统治下的时间非常短，但他对中共的仇恨却相当强烈。

早期的中国战俘都集中关押在釜山的中国大队。由于王顺清“会讲英文，也认识了一些美国人，所以地位比较高”，被任命为大队长⁴³。1951年5至6月，战俘营迁移到距釜山约50公里的巨济岛。据萧力行回忆，此时王顺清已经被美军心战机构CIE（民间情报教育局）调去接受训练，“他受训完后，才到巨济岛72联队当联队长”⁴⁴。而中共情

40 王顺清，ATIS 审讯报告 164-MISDI-1276，1950年12月1日，第2页。

41 同上注，第2、4页。

42 同上注，第2页。

43 马国正访问《萧力行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427页；《孙振冠自述》，吴金锋编《安德舍笔记》第2卷，未出版手稿，第2页。

报显示,1951年5月至10月王顺清、王福田和刘炳璋被联军抽调至东京受训,二王返回战俘营即被任命为联队长⁴⁵。

得到美军青睐的王顺清迅速成为第72号战俘营的头号领袖。反共战俘高文俊回忆,王“比较阴谋,城府较深”⁴⁶。萧力行则认为这个“胖胖的山东人”“有一套领导统御的本领,比较有脑筋”。最重要的是,“在王顺清当了联队长以后,反共组织才有了明显的发展”⁴⁷。反共组织迅速清除亲共势力,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一篇题为〈一个战俘领袖的暴行〉的美军内部报告如此描述“小凯撒”王顺清:“他对超过八千名战俘实行君主式统治,他享有特权,要求服从。他沉迷于暴力,其程度未见于任何其他战俘营⁴⁸。”不过,王顺清通常并不亲自动手,他让副联队长李大安等打手去干这些“脏活”。

在巨济岛,王顺清控制第72号战俘营,而王尊铭很快接替王福田控制86号营。他们通过强力的思想控制和暴力胁迫,统治16,000余名中国战俘,约占全部21,000余战俘的四分之三。1952年4月初,战俘营当局宣布将对战俘的遣返意向进行“甄别”。第72号战俘营的暴力活动随之达到顶峰,数名坚持要回大陆的战俘被杀害,更多人遭受酷刑和残害。曾亲身参与斗争的萧力行坦承:“在72联队之中,杀死好多人。……该杀的也杀掉了。那些被打死的人,肢解以后,放到汽油桶做成的粪桶,跟着粪便抬出战俘营,连着一一起被倒到海里去⁴⁹。”

44 马国正访问《萧力行先生访问纪录》,第427页。CIE即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日文译为“民间情报教育局”,是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SCAP)下属的一个宣传机构。该机构曾负责日本战后民主化期间的教育、出版与宣传;韩战期间向韩国战俘营拓展,进行反共宣传与心战活动。

45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462页。

46 马国正访问《高文俊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305页。

47 马国正访问《萧力行先生访问纪录》,第408、410、428页。

48 该文件题为“Cruelty of a PW Leader,” Bradbury, *Mass Behavior*, p. 329.

49 马国正访问《萧力行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408-410页。

据美军统计,甄别期间第 72 号战俘营有五人、第 86 号战俘营有两人被杀⁵⁰。该数字显然不包括那些被毁尸灭迹的冤魂。在恐怖气氛之下,第 72 联队的 7,000 多名战俘中要求遣返者仅 400 余人,第 86 联队的 8,600 余名战俘中仅 1,128 人要求遣返⁵¹。结果两大战俘营共有 14,000 余人表示拒绝返回中国大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成为到台湾的“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

1954 年 1 月,在从仁川驶往基隆的美军运输舰上,王顺清却险些葬身大海。萧力行称,王身边的“侍从人员”叛变了,“要把他丢到海里头”。负责押运的美军出手干预,把王隔离起来,方才平安到达台湾⁵²。尽管有此变故,蒋经国依然论功行赏,王顺清被核为中校,并授予六等云麾勋章。在 41 名获得云麾勋章的反共义士中,王顺清排名第一。其功绩事实有六项:

一、首先倡导反共抗俄口号,组织团体、领导团体。二、抗议联军虐待战俘,肃清匪谍分子。三、上书总统争取自由,完成领导返台目的。四、反共意志坚决,对同志领导有方法、有计划,为大家谋福利,不贪污、品德优良,从不贪污自私,继续为反共抗俄而牺牲奋斗。五、卅九年该员从匪军带回三个美国人投诚联军阵营。六、在战俘营中发起各种反共教育并组织学校,各大队设有教育股,每中队设

50 美驻韩大使馆致国务卿电,1952 年 6 月 29 日, RG 59/Decimal File 1950-1954/695A.0024/Box 3026, 美国国家档案馆。

51 驻韩大使馆致电外交部电,1952 年 4 月 28 日,周琇环编《战后外交史料汇编—韩战与反共义士篇(一)》,第 234 页。而据亲共战俘统计,第 72 战俘营要求遣返者 700 余人,见张泽石编《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11 页。

52 马国正访问《萧力行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 415 页。Mass Behavior 也记载王顺清在航程中被推翻(deposed), p. 329。而战俘刘斌“压制禁闭室暴徒谋刺联队长”,来台后得到嘉奖,见《辅导总队有功义士请奖名册》,国防部档案,档号 0001671500050136w。

有教育委员,各小队设有教育干事,给大家讲共匪暴行⁵³。

“功绩事实”中两次提起“不贪污”却显得欲盖弥彰。到台后其他战俘纷纷检举其各种不端,例如同样获得云麾勋章的印汝亮在其“功绩事实”中提到“王顺清为争功曾陷害他”⁵⁴。王顺清失去独尊地位,仅是众多有功战俘之一。

讽刺的是,王顺清最终并没有领到云麾勋章。1954年7月,其所属陆军第14军官战斗团向国防部总政治部报告“王顺清久假不归”,将勋章缴回;国防部随即报请注销⁵⁵。当其他“反共义士”代表风光出访日本、东南亚和欧美的时候,王顺清却未入选。1955年,王福田在泰国巡讲,受万众瞩目;而王顺清却在太湖“率领义士十余人打义士高善杰等五人”,后畏罪潜逃⁵⁶。曾经的头号反共战俘领袖就此沉沦,销声匿迹。

(2)刘炳璋:军校毕业生、北平降兵、敌后神秘身亡

单位与职务:第66军197师590团团部教育参谋(连级干部)

叛逃日期:1950年11月25日凌晨6点

11月24日,即王顺清叛逃的当日,毛泽东电彭德怀,批准次日发动第二次战役⁵⁷。次日凌晨三时,26岁的第66军590团参谋刘炳璋在鸭绿江东南一百公里的泰川叛逃,他向南步行五公里,于清晨六时向韩军第1师投降。刘炳璋告诉通中文的韩国翻译,他一过鸭绿江就想投诚。审讯官发现刘“聪颖过人,知无不言,非常配合”。刘炳璋将志愿军诱敌

53 《辅导总队有功义士请奖名册》,国防部档案,档号0001671500050136w。

54 国防部档案,档号0001671600090140w。

55 国防部档案,档号0001671600080097w,0001671600090101w。

56 宪兵司令部呈总参谋长彭孟緝,1955年10月28日,《反共义士自杀逃亡暴行犯上违法案件统计分析表册》,国防部档案,档号0004126500050041w。

5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481-482页。

深入加以围歼的计划和盘托出:志愿军第 66 军埋伏在龟城、泰川、南市一带,第 39 军部署在该部东北,第 50 军在该部东南。第 66 军让开公路,诱敌经泰川北上向鸭绿江西南约 65 公里的龟城进军,随后协同第 39 军、第 50 军,对敌实施合围⁵⁸。

刘炳璋投降后约十二小时,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突袭清川江以东的联军第九军。志愿军第 39 军、第 40 军攻击美第 2 师;第 38 军、第 42 军则围攻韩第 7 和第 8 师⁵⁹。然而,在清川江以西,第 66 军、第 50 军迟至 11 月 26 日晚才发起对联军第一军的进攻,却发现“敌军均在遭到攻击前撤退”⁶⁰。从 25 日凌晨刘炳璋叛逃至 26 日晚,大约有 36 个小时,联军第一军在此间停止前进,不久就开始后撤。该军因而成为第二次战役期间惟一全身而退的联军军级单位。战局的发展证明刘炳璋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他提供的情报很可能拯救了第一军不少官兵的生命。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联军方面因为刘炳璋提供的情报而及时决定后撤,但可确定联军非常重视这位志愿军参谋,对其多番审讯。笔者找到的最早一份刘炳璋审讯报告完成于 26 日,由于该审讯单位没有中文翻译,审讯由通汉语的韩国人翻译,并建议进一步审讯⁶¹。11 月 29 日美军情报二处 G-2 使用测谎器再次审讯,刘通过测谎。审讯官对刘评价很高:“异常敏锐,细节记忆极好。在东方人中其教育程度很高,有丰富的军事作战与教学经验,能领会曾参与的行动,所提供信息非常准

58 刘炳璋(Liu Ping Chang), ATIS 审讯报告 #2842, 1950 年 11 月 26 日, 第 131、135 页; ATIS 审讯报告 #2737, 1950 年 12 月 17 日, 第 126 页。刘炳璋所述计划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描述一致, 见上卷, 第 494 页及附录之《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经过要图》。

59 Mossman, *Ebb and Flow*, 7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 第 483-490 页。

6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 第 494 页及附录之《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经过要图》。

61 刘炳璋, ATIS 审讯报告 #2842, 1950 年 11 月 26 日, 第 131 页。

确可靠⁶²。”29日当天,联军开始全线后撤。或许只是巧合,或许刘的情报影响了美军决策,使联军第一军虎口逃生,而志愿军功亏一篑。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目睹联合国军逃脱志愿军设下的死亡陷阱,刘炳璋一定深感欣慰。

刘炳璋投诚后立刻宣称是忠贞的国民党人,他要求前往台湾加入国军,或“以任何方式加入反共斗争”⁶³。刘炳璋对国民党的强烈感情也许形成于抗战时期。1941年,17岁的刘炳璋离开业已沦陷的家乡山东省泰安大汶口,前往国军控制下的安徽阜阳,进入国军设立的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位于湖北均县武当山下草店镇的中央军校第八分校,1944年8月又迁往西安王曲的第七分校。1946年军校毕业后被分发至北平的国军第92军(侯镜如部)任少尉战术教官。1949年1月,傅作义降共,刘被改编至解放军第66军任连级教育参谋⁶⁴。由于第66军是由中共在河北和山西北部的游击队发展而来,中共亟需刘炳璋这样的战术教官⁶⁵。

1949年3月,第66军随第20兵团开往山西,4月24日攻克太原,遂移师天津整训,参与农业生产。1950年夏收后,35岁以上的士兵多被遣散复员,而年轻的技术人才刘炳璋被留用。10月22日,第66军离开天津,24日到达安东,当晚第197师经鸭绿江上铁桥进入朝鲜新义州。在此后一个月,该师都未与联军发生接触⁶⁶。11月25日刘炳璋在泰川叛逃。

62 刘炳璋,ATIS 审讯报告 #2758,1950年11月29日,第49、57页。

63 刘炳璋,ATIS 审讯报告 #2845,1950年12月17日,第142页;#2758,第54页。

64 刘炳璋,ATIS 审讯报告 #2758,1950年11月29日,第53页。著名作家王鼎钧比刘炳璋小一岁,1925年生于大汶口东南约180公里的山东临沂兰陵镇,抗战时期王鼎钧成为流亡学生,辗转于安徽阜阳、湖北均县,直至陕西南部的汉阴,其路线与刘炳璋高度重合,见王鼎钧《怒目少年》,台北:印刻出版社,2018年,第15-17页(迁徙示意图)。

65 刘炳璋,ATIS 审讯报告 #2737,1950年12月17日,第126页。

66 刘炳璋,ATIS 审讯报告 #2758,1950年11月29日,第53-54页。与《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359页所述日期很接近:23日从天津出发,26日全部到达安东。

刘炳璋在解放军中待了近两年,感受到无时不刻的严密监控⁶⁷。他的阶级出身和军校经历始终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他的思想并未转变。他对中共深恶痛绝,美国审讯官对此颇感惊讶,要他解释中共为何能打败国民党。刘炳璋认为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中共成功地发动了社会最底层的暴民。他们无知,从来就身无一物,将来大概也一无所有。然而,他们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人多势众,大大压倒了国民党的支持者⁶⁸。刘炳璋在天津驻防期间,从亲戚口中得知中共在山东的土改和重税激起民怨,而他家的24亩地被分走21亩。由此看来,刘炳璋的家庭可能只是每日“一粥一饭”式的小地主或富农而已。他受过十年教育,可推测其家庭是重视教育的耕读人家。所以刘特别反感中共发动没文化的农民来恣意公开羞辱文化人,并取代传统精英在乡村的地位⁶⁹。刘在战场上冒死叛逃,投诚后主动要求加入反共斗争,显然是出于他强烈的反共理念。

刘炳璋俨然把自己当成反共联军阵营的一份子。他不但向联军倾囊提供他所知的志愿军计划,甚至提出诸多批评建议。刘指出,他夜行叛逃时直入联军营区,一路竟然没有遇到哨兵,直到碰到一群在用餐的韩国士兵。假如此时共军发动夜袭,后果将是一场灾难。他认为联军必须派哨兵警戒。基于他对共军的了解,刘还提出十几条克敌战术,例如如何对付夜战、近战与伏击;又如飞机应在白天散发传单,此时志愿军多在宿营地休息;联军应以绝对优势兵力发动突袭、占领新义州以切断敌军补给线。他甚至提出鉴于志愿军没有配备防毒面罩,打击敌军最有效的武器是毒气⁷⁰。

67 刘炳璋, ATIS 审讯报告 #2737, 1950 年 12 月 17 日, 第 126 页。

68 刘炳璋, ATIS 审讯报告 #2845, 1950 年 12 月 17 日, 第 144 页。

69 刘炳璋, ATIS 审讯报告 #2845, 1950 年 12 月 17 日, 第 144 页。

70 刘炳璋, ATIS 审讯报告 #2845, 1950 年 12 月 17 日, 第 145-146 页。志愿军士兵通常将催泪瓦斯也称为“毒气”, 此“poison gas”应为审讯官直译。

然而,美军除了不断地审讯他,询问有关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社会情况,却没有把他当成联军一员,他的身份依然是战俘。刘被送到釜山战俘营,成为中国战俘大队(王顺清任大队长)属下的军官队队长。他与王顺清、王福田、李大安、印汝亮、谭兴东、魏世喜、王有敏等人形成早期反共势力的核心⁷¹。1951年5月7日,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邵毓麟密电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呈送一份“依据我派任 UN 军俘虏营工作人员密报”而制作的《中共俘虏中排长以上军官一部名单》,刘名列榜首⁷²。刘炳璋等反共军官战俘的结合为后来反共势力完全压倒亲共势力,并最终实现拒绝遣返打下基础。

刘炳璋大概也是最早接触到台湾人员的中国战俘之一。如前文所述,中共情报称王顺清、王福田和刘炳璋被联军抽调至东京受训。而《反共义士奋斗史》则记录 1951 年 2 月初联军总部将刘从釜山战俘营调往东京作情报审查,长达四个月之久。刘见到的惟一一位华人是来自台湾的翻译郭铮,临别前郭乘无人之机将一本事先包好的《三民主义》赠予“党内同志”刘炳璋。后该书被多次传抄,成为 CIE 战俘学校最早期的教科书⁷³。没有其他资料可以确定刘在东京数月是接受审查还是训练,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可合理的推测:审查机构包括 G-2、CIE 等情报与心战部门;而受审战俘积极配合,获得优待,回到战俘营后则声称自己在

71 《孙振冠自述》,吴金锋编《安德舍笔记》第 2 卷,第 2 页;梁实秋《光荣的悲剧第一幕》,《反共义士奋斗史》,台北: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1955 年,第 20 页。

72 “驻韩国大使馆致国防部电”,1951 年 5 月 7 日,国防部档案,档号 00041467 00010005w。

73 陈纪滢《巨济岛汉贼不两立》(上),反共义士奋斗史编纂委员会编《反共义士奋斗史》,第 39-42 页。郭铮是国军陆军军官,由联军总部从台湾聘为美国陆军部文职人员(Department of the Army Civilian (DAC))。见高庆辰《空战非英雄》,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 年,第 245 页。其他几批获聘翻译包括一些通英语的军官及其他人士,如陆以正、黄天才等人。黄和陆是美军雇员,同情渴望逃往台湾的战俘,但不一定是台湾派遣的特工。即使这些翻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情报人员,他们往往主动为台湾方面收集情报或协助反共战俘传递讯息。参见陆以正《郑究与我在韩国的那段日子》,载于黄天才《我在 38 度线的回忆》,台北:印刻出版社,2010 年,第 186-187 页。

东京受训,以抬高自我地位。

另外,联军总部很可能曾利用战俘参与心战传单、广播稿之设计。1951年6月底,蒋经国门生楚崧秋、孔秋泉获聘至东京总部心战部门才三周,即向“蒋教育长”密报:“此间有战俘六人,均系国军旧部,托转信件一封,请阅后代交。另一件系上次留下者,为釜山之口供⁷⁴。”该文件证实战俘在东京与台湾雇员接触。虽无直接证据显示刘炳璋曾从事心战文宣工作,但也不能排除这一可能,这为他半年后申请离开战俘营去为联军服务埋下伏笔。

从东京回到战俘营,精通英文和权谋的王顺清被任命为第72联队联队长,而刘炳璋回到军官大队却大权旁落。亲共战俘领袖孙振冠看出刘有“不满情绪”;孙还发现刘颇有正义感,刘反感美军强迫战俘着红色囚服,也不满战俘干部“打骂、剥削”普通战俘。孙试图对其“统战”,离间反共阵营。孙振冠称,“后来他们内部果真吵得厉害,我扩大了他们的矛盾”⁷⁵。孙的说法虽有自夸之嫌,不过刘炳璋的确成为反共势力内斗的最早牺牲品。

管理第72联队医药所的军医战俘孟明曾与刘炳璋同住一室,他回忆刘器宇不凡,“好多人里面,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而且“很负责、很勇敢、很有正义感”。刘还向孟明学习简单的英文:“My name is Liu Ping Chang. I am a captain”(我是刘炳璋上尉)。然而,副联队长李大安却视刘为威胁,“嫉妒他的才气”,终于寻机“公开打他,拿着棒子乱打”,打得皮开肉绽。孟明得讯后赶去探望,刘却说:“你们不要来,牵涉进来不好,会找你们麻烦。”孟只能派人送碘酒棉花了事。刘炳璋不久就悄然从战俘营消失。孟听说刘写报告给美军,要求离开战俘营,后被调去从事敌

74 《楚崧秋、孔秋泉致蒋经国信》,1951年6月29日,蒋经国总统文物/国防部总政治部任内文件(4),国史馆藏,档号005-010100-00053-039。

75 《孙振冠自述》,吴金锋编《安德舍笔记》第2卷,第5页。

后情报工作,就此失踪⁷⁶。《反共义士奋斗史》含糊其辞,称刘“牺牲在韩国”⁷⁷。不过中共从未宣布捕获刘。

联军方面有关刘炳璋的最后档案纪录是战俘名录上的寥寥数字:“逃亡,1952年4月18日”⁷⁸。而事实上,被列入逃亡名单的战俘大多被美军情报单位征调从事极其危险的工作:他们从空中、陆地或海路渗透至北韩搜集情报,然后步行数公里、数十、甚至数百公里回到联军阵地。刘炳璋为躲避李大安的迫害,申请为联军服务,他所想像的工作可能是在东京联军总部从事心战宣传或情报分析,但他肯定没想到会被投入九死一生的敌后情报工作。他在投诚之初曾誓言“愿以任何方式加入反共斗争”,不幸一语成讖。

刘炳璋这位满怀正义理想的军校毕业生冒险逃脱中共的桎梏,却未能躲过战俘营暴徒的棍棒。他对美军披肝沥胆,最终却被美军冷血地遣往敌后送死,谎称其“逃亡失踪”。刘炳璋对国民党忠贞不渝,最终却未能如愿到台湾。英雄绝路,不知所终。

3. 第三次战役(1950.12.31-1951.1.8)

志愿军在1951年新年之夜发动第三次战役,惊魂未定的联军从38度线撤退,1月4日弃守汉城,再一直退到37度线。此时麦克阿瑟将军和华盛顿开始讨论联军应何时、如何撤离韩国。在此阶段,中共士兵很难有机会跑到对方阵地,因此在短暂的第三次战役中鲜有志愿军士兵被俘或投诚。

76 孟明口述,常成访问,2015年3月31日,新北市。孟认为刘牺牲在敌后。

77 反共义士奋斗史编纂委员会编《反共义士奋斗史》,第42页。

78 战俘名册 Box 2383, 1955-1956, 战俘纪录处, RG389(军法处), 美国国家档案馆。刘离开战俘营的时间应该早于该日期,大约在1951年底或1952年初。

4. 第四次战役(1951.1.25-4.21)

漫长的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补给线过长,攻势渐成强弩之末。而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威(Matthew Ridgway)发现志愿军受制于单兵携带弹药给养,因而进攻不能超过一周的“礼拜攻势”特点,率联军逐步转入反攻,令志愿军屡尝败绩,节节北撤。3月14日中朝军队退出汉城,到4月下旬已全线退守到38度线以北。在此全线撤退约100公里的运动战以及局部拉锯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逃亡或者藏匿的机会。多位重要的反共战俘领袖在此阶段叛逃,包括李大安、印汝亮、谭兴东、孟明等人。

李大安:卡车司机、战俘营“活阎王”

单位与职务: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第4卡车团1连3排7班
卡车司机

叛逃日期:1951年3月24日

曾任第72联队副队长的李大安是最恶名昭彰的反共战俘,亲共、反共双方很多战俘都回忆,李是最暴烈残酷的反共战俘。他曾棒打反共领袖刘炳璋,亦曾亲手残杀多名亲共战俘。“细高个,挺白净,洒脱,不像粗人。”这是甫向联军投诚的李大安给亲共战俘于庆德留下的第一印象⁷⁹。然而,战俘营中的李大安却是另一个形象。李大安的保镖回忆:李“个子中等,虎不唧机的,……弄不好的话三句话就过来拿棒给你干⁸⁰。”战俘张一夫记得,“李大安戴着牛仔帽,屁股上挂着棒子。看你不顺眼,二话不说,就皮鞋踢几脚,棒子敲两下。大家都不敢反抗,私下叫他『活阎王』⁸¹。”

79 《于庆德访问记录》,1983年6月5日,《安德舍笔记》第2卷,第185页。

80 《刘通和(化名)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329页。

81 常成访问整理《张一夫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13,2013年11月,第141页。

《反共义士奋斗史》将李大安描绘成一个“燕人张翼德”或“黑旋风李逵”式的英雄：“一条彪形大汉，正在发出最动人的声音，从事最惊险的工作，捧着敌人的脑壳，狂饮敌人的血，跃进波涛汹涌的海，营救行将灭顶的人。”尽管此悼词式的反共文学明显夸张，却提供一些佐证：李“性情非常急躁，说好了，什么都好，搞翻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⁸²。“这个人还不错”，警备队干部萧力行轻描淡写地回忆，“就是有点恶霸。……一开始李大安也不是一个重要的干部，因为他够狠，所以逐渐搞起来”⁸³。民伕司机李大安居然能在数千名战俘中脱颖而出，力压前国军军官、军校学生及青年军，成为副联队长，并迫使一两千名中共党团员屈服认命，不敢反抗，靠的就是一个“狠”字。

李大安恶名昭著，而其战前经历却鲜为人知。所幸李投诚后受审讯留下个人简历，1953年被美军情报单位空投北韩，被共方俘获后又写下数万言的自白书。两个文件所述重大事件基本吻合，其履历大致可循。1927年李大安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市中兴区，读过四年半小学，后成为卡车司机。1945年日本投降，中共从苏军手中接管安东，11月李加入反共游击队。次年11月，国军占领安东，李返回安东驾驶轿车和卡车，直至1947年夏随国军撤至沈阳⁸⁴。李大安后来吹嘘他曾给时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开车⁸⁵。

1948年4月，李大安离开陷入重围的沈阳，返回安东与妻女团圆。为获得国军的出城路条，李接受潜伏任务。7月李即被中共逮捕⁸⁶。他被控藏有枪枝，数次被吊起，“打得死去活来有四、五次”。他请求妻子送

82 反共义士奋斗史编纂委员会编《反共义士奋斗史》，第84-85页。

83 《萧力行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426-427页。

84 于劲引用自白书，于劲《厄运》，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76-77页；李大安(Li Ta An)，ATIS 审讯报告 KG0486，1951年9月3日，第1页。

85 常成访问整理《张一夫先生访问记录》，第141页。

86 于劲《厄运》，第76页；ATIS 审讯报告 KG0486，第1页。

卤水来助其自杀，被拒绝。他又试图用裤带上吊自杀，却被同监犯人阻拦。其后被送到墩坎子监狱，有6个月的时间“没吃过一顿饱饭，吃的是豆饼、蔬菜”⁸⁷。稍有差错，比如上厕所时间太长或向看守报告的声音太小等，就被罚站罚跪。1950年8月李大安两年刑满，获释回家。他去找政府请求介绍工作，却被呵斥：“你还有什么资格来找我介绍工作？还不回去老老实实待着？”⁸⁸

韩战爆发后，李大安被政府送往沈阳附近的新民县编入运输第一团任民伕司机，将物资从吉林省临江县运往朝鲜长津湖、黄草岭。往返四次后李大安就开小差跑到沈阳，独自流浪却无法生存。无奈之下，他只得回到运输团⁸⁹。随着中共的社会控制不断深化、强化，李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无隙可存，失去独立谋生的空间。所幸李还具有中共急需的一技之长：汽车驾驶。虽然参加入朝汽车团非常危险，但这可能是李大安唯一可以证明自己在“新社会”尚有剩余价值的机会，或许能洗刷历史污点，重写履历。对那些在“新中国”濒临绝望的人，这样的冒险或许还能提供逃脱的可能。

1951年2月，李大安被编入第四卡车团，27日驾车入朝，3月24日就叛逃⁹⁰。据《反共义士奋斗史》，李大安驾车到前线卸下弹药后就开足马力往联军阵地飞驰，后来才猛然意识到身旁还有一个熟睡中的正驾驶，于是他“顺手举起预备好的铁锤，对准他的脑门，猛烈的一锤，陷进了半吋，血像自来水般……冲了出来”⁹¹。”相比这个惊险血腥的投奔自由的画面，自白书中的叛逃过程就平淡很多：李奉命去前线接运伤员，中途在抱川附近的松林里宿营。由一名韩国妇女带路，李大安等六人拿着美

87 豆饼是大豆榨油的副产品，一般作牲口饲料。

88 于劲《厄运》，第76-77页。

89 于劲《厄运》，第77页。

90 李大安，ATIS 审讯报告 KG0486，第1页。

91 反共义士奋斗史编纂委员会编《反共义士奋斗史》，第86页。

军“优待俘虏”传单投向联军⁹²。由此看来,前一个版本大概是基于李大安吹嘘再加工而成的神话。

李大安投诚后被送往釜山战俘营。协助登记的战俘于庆德回忆,李大安一进登记科就不满地大喊:“老子是驾车起义过来的,老美把我送到这里来是不公平的,我不是俘虏!”原来李在叛逃前听说蒋介石派来三个师在联军一方⁹³。他本以为投诚后可以加入联军或被送往台湾,彻底摆脱中共的统治。然而联军却将叛逃投诚者和其他被俘者一视同仁,都当成战俘关押在一起。这让叛逃者大失所望,他们意识到:联军随时可能为了换回联军战俘而将他们遣返,这对他们意味着死亡。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抵制遣返,因此他们必须在战俘营组织起足够多的反共战俘,集体反对遣返,要求去台湾。

1951年7月2日,李大安和另一名叛逃司机印汝亮在巨济岛第72战俘营率领179人饮血酒宣誓,建立第一个反共战俘组织“反共救国青年团”。该组织继而发起五次血书请愿运动,请求联合国、美国、特别是蒋介石营救去台湾⁹⁴。血书通过联军聘用的台湾翻译秘密传送到当时在釜山的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继而送达台北。1951年10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印亮文、李大安等一千余在韩被俘后血书陈词效忠党国,阅此对旧部更觉惭愧矣⁹⁵。”这是蒋介石日记中第一次提到韩战战俘,也标志着蒋开始思考把战俘接运来台。蒋日记中仅出现过四个韩战战俘的姓名,李大安即其中之一。

严格地说,李大安并非国军旧部。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民伕司机如何能够在数千名前国军和中共官兵中崛起,成为领袖?战俘营内势力

92 于劲《厄运》,第76页。时间地名以审讯纪录为准。

93 于劲《厄运》,第75、99页。

94 反共义士奋斗史编纂委员会编《反共义士奋斗史》,第35-37、52页。

95 《蒋介石日记》,1951年10月28日。蒋可能把“印汝亮”误记为“印亮文”,战俘领袖中并无此人。

众多,除了亲共战俘,还有行伍出身的国军军官派系、军校派系、青年军派系,也有地域派系,如东北帮、云南帮和四川袍哥等。李大安依靠东北帮和汽车司机帮,控制警备队,用拳头和棍棒打天下。由于中共党员纷纷隐姓埋名、缩头保命,对李大安的最大威胁来自军校背景的战俘。军校 23 期的高文俊回忆李“对青年军什么都不怕,就怕军校背景的人”。“有好多次,他都把军校同学集合起来,找他的打手进来,带到他屋子就打那些违抗他的人,……就像共产党的公审一样,做给你看,让你心生恐惧⁹⁶。”刘炳璋就是受刑人之一⁹⁷。既然李大安敢对国民党菁英痛下毒手,对亲共战俘施暴更是肆无忌惮。

为宣示反共决心并阻吓战俘回大陆,李大安等人发动刺字运动,要求每人在手臂和身体上刺上“反共抗俄 杀朱拔毛”等反共口号及图案,抗拒者则被胁迫、殴打。暴行在 1952 年 4 月上旬的“甄别”前夜达到顶点。在第 72 号战俘营,李亲自拷打多人,杀害至少两名坚持要回大陆的战俘,包括前四川大学外文系学生、战俘翻译林学逋和军校 23 期毕业的阳文华。李的保镖回忆,“那个时间你真的要回家,不回台湾,李大安一定要把你打死,……打死好多。”他亲眼目睹李杀害林,“他一榔头从后脑杓打下去,一头就栽在里面”⁹⁸。数名亲共战俘熬过恐怖之夜,次日通过“甄别”脱离第 72 号战俘营,他们称李大安先用刀割掉林学逋等人身上的刺字,将其杀害后又挖心示众⁹⁹。美军的尸检报告显示林左臂有 12 乘 7 公分见方的皮肤被割去,左胸腔和左腹腔被刀刺穿,却未提及心脏是否完好¹⁰⁰。

96 马国正访问《高文俊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 305-306 页。

97 高文俊口述,常成电话访问,2015 年 8 月 12 日。

98 《刘通和(化名)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 329 页。时任第 72 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的杨树芝回忆该联队有十一、二人在“甄别”前夜被杀,杨树芝口述,常成访问,2014 年 1 月 27 日,台北。据美军统计有五人遇害,参美驻韩大使馆致国务卿电,1952 年 6 月 29 日。

99 张泽石编《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第 330-333 页。

李大安及打手们对坚持遣返者大开杀戒,战俘营当局却袖手旁观,使得众多有意回大陆的战俘怀疑次日“甄别”的真实性,因而不敢选择回大陆,七千多人的第72号战俘营仅有数百人选择遣返。亲共、反共战俘经“甄别”分流,随被移往济州岛的不同战俘营。此时,大部分战俘拒绝遣返的大局已定,而残暴的李大安的存在价值就降低了,后续的发展变得匪夷所思。

如前文所述,刘炳璋被李大安殴打后被美军征调,派往敌后失踪。一年后,李大安亦步其后尘。1952年11月底,美军情报特战单位“8240部队”下属TLO“战术联络处”将李大安秘密征调,送往仁川外海60公里的仙甲岛受训¹⁰¹。此刻李才发现岛上的数十名战俘特工多是军校背景,正是曾被殴打欺凌的冤家对头;而结训后他将和这些人编组潜往北韩敌后,生死与共。昔日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李大安颇识时务,立刻变脸。在高文俊面前“谦卑多了”,屡屡为过往的“不周之处”道歉,并虚心请教敌后生存之道¹⁰²。他极力巴结医生孟明,通过这位通英文的前青年军与美军教官沟通¹⁰³。

尽管高文俊宽慰李大安“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孟明等人也带李一起下海捡海螺,炒海鲜,大快朵颐,李依然感到不安。两个月的训练过程中,李越发紧张,他找不到“心同道合”、让他放心的队友¹⁰⁴。更严重的事件发生在TLO汉城前进基地:已数次完成敌后任务的战俘特工集体罢工,他们提出条件:“李大安不出任务,我们就不出任务”,然而他们又拒不与李同组¹⁰⁵。无奈之下,美军破例让李返回济州岛战俘营挑人

100 第117号案件报告,战俘营事件调查, RG 554(远东总部),美国国家档案馆。

101 大鹰《志愿军战俘纪事》第二版,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TLO: Tactical Liaison Office。

102 马国正访问《高文俊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305页;高文俊口述,常成电话访问,2015年8月12日。

103 孟明口述,常成访问,2013年1月3日,新北市。

104 孟明口述,常成访问,2013年1月3日,新北市。

组建“李大安特别情报组”。入选者都是李的东北同乡亲信,包括 21 岁的中俄混血儿刘飞。刘到了 TLO 大呼上当:“李大安自己去送死,还要拉上我来垫背!”¹⁰⁶”

1953 年 4 月 22 日夜,李大安小组空降在距 38 度线 300 公里之遙的鸭绿江南岸碧潼附近的飞来峰,其携带的发报机未发出任何信号,三天后即被捕¹⁰⁷。“开玩笑!”精通无线电的战俘特工杨树芝对此毫不意外,“他初小文化,怎么可能掌握摩斯电码和发报机?”¹⁰⁸” TLO 挑选的战俘特工多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军事素养的军校生、国军军官或青年军,而李完全不符合此标准,其入选显得相当吊诡。据孟明回忆,先期被征调的战俘特工曾向美军建议:李大安“很厉害,应该到我们单位,可以拓展他的抱负”¹⁰⁹。结果,李没能实现他到台湾的抱负,而昔日的受害者却实现了他们的报复。李最终于 1958 年在北京被枪决¹¹⁰。李大安迷信暴力,因“狠”而崛起,又因“狠”而埋下覆灭的祸根。他制造了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而其个人的结局却又是一场命运的恶作剧。

5. 第五次战役(1951.4.22-6.10)

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发动的最大规模战役。面对中朝军队的第一阶段攻势(4 月 22 至 29 日),联军有计划地撤退并保持接触,伤亡有限,并守住了汉城。中朝方面短暂休整后重振旗鼓,从 5 月 15 日开始第二阶段的攻势,联军继续撤退,诱敌深入。等志愿军的“礼拜攻势”转入尾声,联军立即对步行的志愿军展开迅猛的机械化包抄反攻。志愿军损失

105 廖汀口述,常成访问,2015 年 6 月 3 日,新北市。

106 高文俊口述,常成电话访问,2015 年 8 月 12 日。

107 大鹰《志愿军战俘纪事》,第 205 页。

108 杨树芝口述,常成访问,2015 年 3 月 24 日,台北市。

109 孟明口述,常成访问,2013 年 1 月 3 日,新北市。

110 大鹰《志愿军战俘纪事》,第 205 页。

惨重,特别是3月刚从四川入朝的第三兵团第60、第12军在撤退阶段被联军穿插包围,大量官兵被俘,其中第180师几乎全军覆没,数千人被俘。中国战俘总人数从3月的1,672人暴增十倍至6月的17,182人¹¹¹。1951年4至6月被俘人数占有中国战俘的四分之三。

王尊铭:人民服务总队干部、胡宗南部连长、第86号战俘营联队长

单位与职务:第12军31师91团炮兵营82毫米迫击炮连教官

叛逃日期:1951年5月25日

第五次战役的大量战俘涌入,使得巨济岛第72号中国战俘营迅速爆满,新建的第86号战俘营很快就收容了8,000余名战俘,该战役中主动投诚的王尊铭不久成为联队长。1952年4月“甄别”之后,中国战俘营迁往济州岛并重组,王尊铭继续担任联队长。1953年7月27日韩战停战,双方随即开始交换愿意遣返的战俘,而拒绝遣返的反共战俘还要煎熬等待半年才知道他们最后的命运。

8月,美国社会科学家在济州岛访问王尊铭三天,发现他有一种天生的领导特质:“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行动者;异常善于表达、条理清晰。身材高大,很有军人气概,言谈间流露出威严与信念¹¹²。”王早已确立其反共战俘领袖的地位:在其权力的高峰,他控制巨济岛上8,000余名中国战俘,而在济州岛他统领约5,000人。此刻很难想像,三年前他曾臣服在中共脚下。1949年底,国军连长王尊铭在四川被中共俘虏,并接受

111 《每月战俘人数统计表》“POW Population by Month,” July 1953, Box 1, Statistical Reports Relating to Enemy POWs, 1950-53, Office of the Provost Marshal, RG 554, 美国国家档案馆。See Chang, *The Hijacked War*, p. 391.

112 Bradbury, *Mass Behavior*, pp. xx, 122.

改造,但他内心并未屈服,“心里形成了一种至死不忘的复仇念头”¹¹³。1951年5月王在朝鲜前线叛逃,后成为最重要的反共战俘领袖之一。他的叛逃和崛起与他在国民党和中共统治下的复杂经历有直接关系。

1926年王尊铭出生于延安以北约260公里的陕西省神木县,其家庭是与国民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地主官僚家庭:其父在县政府负责人事,长兄在当地任警长,其家族还有一间布匹店和约100亩地。1938年,中共进入神木县,当地不少地主家庭都把子弟送到国统区报考军校,王的父母请求一名国军军官友人将年仅12岁的王尊铭带走,王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抗战时期,王跟随这位军官辗转安徽、河南¹¹⁴。数年后在韩国战俘营,王走南闯北的经历成为他的重要资产,他常说:“我生在陕西,长在河南,我的干爸是XX人,干妈是XX人。我在釜山战俘营还为弟兄们烧过开水……”¹¹⁵。”他擅长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战俘称兄弟、拉近距离,建立自己的势力。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就读的国军高中从河南迁至江苏苏州,不久解散。1946年3月,王尊铭考入国防部新闻训练班,四个月的政治训练之后,王被编入“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任准尉,前往苏北、鲁南农村建立反共保甲组织。在激烈的国共争夺中,王深刻了解到中共的动员与控制手段。他发现,在中共严明纪律和爱民作风的背后有一个宏大计划:彻底摧毁“传统的忠诚与道德”,以对毛和中共的效忠来取代对家庭的效忠¹¹⁶。1947年王尊铭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并于1948年初被选派到南京受训三个月,其后分发到胡宗南麾下第90军第61师任连级政工干部,在陕西蒲城一带与中共作战。1948年10月王所属第181团几被全歼,

113 Bradbury, *Mass Behavior*, p. 121.

114 Wang Tsun-ming, in *Mass Behavior*, pp. 123-124. 对王的采访囊括详细的个人历史,其简历与美军审讯结果基本一致。见 ATIS 审讯报告 KG0562, 1951年9月15日,第1页。

115 王厚慈口述,常成访问,2010年4月22日,桃园。王厚慈,军校23期毕业。

116 Bradbury, *Mass Behavior*, pp. 125-132.

王侥幸脱逃,后晋升上尉。1949年王加入国民党,并被升为步兵连长¹¹⁷。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王却决心保卫这个政权。

1949年12月底,中共在成都地区彻底击溃胡宗南集团,而第90军是顽抗到最后的几支部队之一。王尊铭称,即使最终长官命令投降,他仍拒绝执行命令,并率部逃跑,却被已投共的川军抓获。被俘后他又数次试图率部逃跑,皆告失败¹¹⁸。王自诩他的反共信念比长官更加坚定。而中共对这个“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实施高强度的思想改造,持续了整整一年。

1950年12月,中共对国军战俘的改造终于告一段落,部分人员被分配到新疆屯垦,而王尊铭等人被分拨至第12军第31师,任迫击炮连训练教官,属排级军官。不久王辗转获悉陕北老家年迈的父母被扫地出门,发配至绥远开荒。王变卖所有个人财物,请求“上级组织”代为汇款。上级收钱后却不汇款,反而批评王“思想依旧反动”。1951年3月25日,第12军从辽宁宽甸县过鸭绿江入朝。王尊铭拾到联军空投传单便开始筹划叛逃。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全线后撤,王乘机于5月25日向联军投诚¹¹⁹。

王尊铭叛逃的动机与其他反共战俘领袖非常相似。在中共新政权下,前国军军官大多戴着两顶最危险的“帽子”:地主家庭出身和反革命(手上沾有共产党的鲜血)。同时王还被指控道德败坏:嫖娼、强暴妇女、鸡奸男性¹²⁰。他们亲身经历痛苦的思想改造,并可以预见将来无休止的持续改造、精神与肉体折磨。叛逃既是出于理性判断,也是出于求生的本能。

117 同上注, pp. 133-134.

118 同上注, p. 134. 不过在审讯报告 KG0562 中,王没有提及这几次逃跑未遂的经历。

119 王尊铭, ATIS 审讯报告 KT0190, 1951年5月26日, 第1页; KG0562, 1951年月15日, 第2页; Bradbury, *Mass Behavior*, pp. 157-159. 投诚日期以 KT0190 为准。

120 Bradbury, *Mass Behavior*, p. 142. 王解释后两项罪名是被迫编造自污, 方能检讨过关。

在第 86 号战俘营,王尊铭成为联队长,实施一套暴力胁迫和思想控制并用的制度。如果说体罚打骂是国军的传统,思想灌输和心理控制则是王从中共的改造过程中学到的新方法,即所谓的“用共产党的方法来管理共产党”¹²¹。或许因为没有像李大安那样嗜血成性的打手,第 86 号战俘营的控制要比第 72 号稍微宽松一些。尽管如此,在“甄别”前夜该联队至少有两名坚持回国的战俘被杀害。“甄别”中 8,600 余名战俘中仅有 1,128 人要求遣返。“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约半数来自该战俘营。

来台后王尊铭被授予六等云麾勋章,其“功绩事实”为:

组织反共青年团,反共同盟会,反共救国团,成立警备队,感化动摇分子,说服亲共分子,调查匪特,组织领导游行,反对英国所提强迫遣俘计划、印军之武力威胁,及领导全体义士绝食以抗印、波、捷为中立国¹²²。

1954 年 2 月 19 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于台北开幕,一个月后将毫无悬念地选举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开幕当日,蒋完成对国大报告后走上中山堂的阳台,接受广场上反共义士的欢呼致敬,并聆听王尊铭宣读致敬书。此刻蒋经国立于王身后¹²³。67 岁的蒋介石颇为动容,当晚在日记中写道:“对一万四千名义俘训示,并接受其颂词,情绪热烈,令人热泪盈眶矣¹²⁴。”十几天前才到台湾的王尊铭获此致敬殊荣,在众多义士领袖中脱颖而出。

王尊铭与王顺清都曾任战俘营联队长,来台后被核为中校。蒋经国

121 相关讨论见《马群耕(化名)先生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第 251 页。

122 《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请勋奖建议册》,国防部档案,档号 0001671500050040w。“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五国成员为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与瑞典。

123 《中央日报》(第 4 版),1954 年 2 月 20 日。

124 《蒋介石日记》,1954 年 2 月 19 日。

为前军官战俘特别成立第 14 军官战斗团,由高魁元中将统领,所有军官都如同士兵接受整训。王顺清显然厌倦军旅生活,先是久假不归,后聚众打人,畏罪潜逃。而王尊铭则适应良好,如鱼得水。1954 年 2 月初国防部派 60 名“女青年工作队”队员教义士唱歌及各项体育运动。两年后王尊铭与“花木兰”傅蕙结婚,成为到台后第一个成家的韩战反共义士¹²⁵。这一令众人羡慕嫉妒的婚姻为王尊铭的生死逃亡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结 语：“新中国蜜月期”的叛逃者

1954 年 1 月 25 至 27 日,王顺清、王尊铭和王福田等战俘领袖与一万四千余名“反共义士”乘 15 艘美军登陆舰分三批抵达基隆,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他们的逃亡之路终于走到终点。而此时,被美军情报机关征用从事战后工作的刘炳璋已神秘失踪;李大安已身陷中共囹圄,四年后将在北京被枪决。刘、李冒险犯难,叛逃成功,却又被美军送入虎口,终未能死里逃生。

叛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决心、胆量、机缘和运气只有极少数人同时拥有这四大要素,走完可能长达数年、行程万里的生死逃亡路,抵达终点。本文记录的五名“新中国的叛徒”,他们都是在战场叛逃成功并成为战俘营领袖而为人所知。然而,刘炳璋和李大安有心、有胆、有缘,却无运走到终点。相对于极少数幸运的叛逃成功者,还有多少叛逃者像刘、李那样有缘而无运,丧命于逃亡路上、战场上或者刑场上呢?更有多少人有胆而无缘,决心逃离却没有找到机会呢?更有多少人有胆而无胆,渴望逃离却没有决心和胆量呢?

叛逃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在个人,是“生命的冒险”;对家庭,意味

125 《中央日报》(第 1 版),1954 年 2 月 8 日;《联合报》(第 3 版),1956 年 2 月 2 日;孟明口述,常成访问,2015 年 3 月 31 日,新北市。

着抛妻弃子、株连家族¹²⁶。当叛逃者作出如此生死攸关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时,他们冒万死以求一生。然而,他们还需要天赐机缘和好运,才能成功抵达终点。到达台湾的反共战俘即属于此类少数的幸运者,而不幸者则肯定更多。

依照中共官方认可的最保守估计,“真正的『不愿遣返』的『反共战俘』……大约有 3,000 人左右”,而其余的 11,000 名左右的“反共战俘”属于态度摇摆者¹²⁷。如果忽略不同程度的“态度摇摆者”,仅把 3,000 人算成叛逃者,他们占全部 21,000 余名中国战俘的百分之十四或七分之一¹²⁸。也就是说,每七个中国战俘中就有一人是真正的反共战俘。这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数字,因为这 3,000 人都是同时具有决心、胆量、机缘和运气四大要素的成功叛逃者。那么,在相似人群中,有胆而无缘的潜在叛逃者和有缘而无运的叛逃失败者的数量会更加惊人。

《传记文学》创始人刘绍唐原是中共第四野战军宣传部秘书,1950 年夏从武汉叛逃至香港。刘决意外逃,又因职务之便获得伪造证件的机缘,而且幸运地一路未被盘查追捕。“我的能够出走,与其说是我的决心,不如说是一个难得的机缘。”刘坦承,“假如没有一个如我所获得的机缘,任何决心都只能更招致自我牺牲的后果。”他认为,“企图逃出铁幕而有随时出走决心的人,我深信那将是一个有分量的数字¹²⁹。”

这个“有分量的数字”是无法准确计算或统计的。不过,韩战战俘的数据或可供分析,做粗略的估算。由于四分之三的志愿军战俘是在第五次战役失利过程中意外地大规模被俘,因此他们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志愿军样本¹³⁰。据中共的估计,每七个战俘就有一个是真正的“反共战俘”,而当时志愿军的总体构成是中国大陆青年男性人口的反映,是否可以进

126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台北:新中国出版社,1953 年,第 4 版,第 203 页。

127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 290 页。

128 $3,000 / (14,342[\text{台湾}] + 7,110[\text{大陆}] + 12[\text{中立国}]) = 13.98\%$ 。

129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第 203 页。

一步假设当时大陆青年男性中每七个,或少一些,每十个或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人渴望逃离“新中国”呢?无论哪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惊人的“相当数量的少数”,更叩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共建政之初,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人渴望逃离?为什么他们如此绝望、决绝?

本文讨论的五名叛逃者入朝的时间是在1950年秋至1951年初,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一年。相对于中共自1957年接踵发起的一系列灾难性政治运动,如“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1950年代初中期(1949-1956)往往被认为是一段相对稳定平和、中共与民众关系良好、充满希望的时期。中共政府和大陆民间时常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西方学者则称之为“蜜月期”¹³¹。然而,随着Strauss、Brown、杨奎松、Dikötter等学者对1950年代初期的“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研究的深入,“蜜月期”一说难以为继¹³²。MacFarquhar便将“蜜月期”缩减为1949年10月中共建政至次年6月韩战爆发或10月中共参战之间短短的一年时间¹³³。

130 诚然,在第五次战役之前的中国战俘中,主动投诚者的比例有可能比较高,但其总数很小(至1951年3月为1,672人),因此影响有限。参见《每月战俘人数统计表》。“POW Population by Month”。

131 关于“黄金时代”,见Roderick MacFarquhar《前言》,《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网站,2014年12月),http://www.chinesepress.com/chinesepress/promotion/DCPC/DCPC_e.htm (2015年8月24日上网检索);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The China Quarterly* 137 (1994.4): 1-2. 关于“蜜月期”,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52;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 107, 114.

132 Julia C. Strauss,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1 (2002.1): 80-105;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3);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五名反共战俘的经历说明,这一年的“蜜月期”也只是一个幻象。当众多农民、知识分子、甚至部分资本家还沉浸在对新政权的期待与想像中的时候,这些叛逃者已经历残酷的政治运动和镇压,成为阶级斗争的受害者。他们大多来自地主或富农家庭,往往还背负着曾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的“反革命”历史。即使是出身贫农阶级的人,如王福田,也可能被戴上“反革命”、“兵痞”的帽子。属于“剥削阶级”的富农、地主和资本家在中共的统治下反覆遭受清算,而“反革命”分子在任何运动中更是首当其冲。

从一定意义上说,叛逃者先知先觉,他们自认在中共令人窒息的统治下难以生存,因此决心逃离。1953年,胡适为《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撰序,称赞刘绍唐早在中共建政之初所谓的“蜜月期”就“已经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看见红色的罗网从四面八方紧紧围过来,……于是就逃了出来¹³⁴。”在此意义上,刘绍唐与韩战叛逃者所见略同。

与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中共建立的“新中国”是没有退出机制的:几乎没有人可以选择退出,没有人可以自由出国。而“抗美援朝”战争则提供了一线脱逃的可能。尽管战争异常危险,未来的叛逃者们被迫或者自愿参军以求在“新社会”赎还原罪、重获新生,或许也有人意识到战场这条险路可能是逃离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志愿军当时非常缺乏汽车司机和炮兵等技术人员,同时中共对防范叛逃颇有经验与自信,也未认真考虑过部队大规模被俘的可能,所以一些“未改造好的不良分子”被仓促送往朝鲜前线。中共用人孔急与大意也为叛逃留下一线可能。

中共建政之初,挟军事胜利之余威,建立一套以暴力震慑为基础,以

133 Roderick MacFarquhar 《前言》。他认为“蜜月期”结束于1950年10月10日开始的“镇反”运动。该运动至少杀人71.2万,占全国人口之千分之1.24,超出毛泽东发出的千分之一指标,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216-217页。

134 Liu Shaw-tong, *Out of Red China*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3), p. xiii.

群众动员为方法,以强制参与、无退出机制为特色的社会控制与动员制度。在“新中国”,民众既无说话的自由,亦无不说话的自由;既无用手投票的自由,亦无“用脚投票”的自由。“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成为每一个人的唯一正确选择,而且最正确的表现(或表演)就是“发自内心地心悦诚服”。陈永发认为,在中共体制之下,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服从是“强迫与志愿的结合”,他们“唯一可能的行为选择,经常只有忍不住的不断屈服和投降”¹³⁵。知识分子如此,普通民众亦是如此。在此所谓的“蜜月期”,在中共高压强制之下、别无选择的服从到底有多少志愿,多少强制,多少恐惧呢?

在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制度下,个人惟有使用极端的方式,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逃离。五名“新中国的叛逃者”在韩战战场上冒死向联军投诚,期待获得联合国庇护,送往台湾或其他国家,以期彻底脱离中共。然而,联军并不区分叛逃者与被俘者,都一视同仁关入战俘营。叛逃者发现,虽然美军在战场上极力诱降,他们投诚后,美国政府却绝口不承诺送他们去台湾或其他国家,反而随时可能为了停战和交换战俘将他们送回大陆。美国政策自相矛盾、权宜短视之特质令叛逃者惊恐不安,为了求生他们必须组织更多战俘来抵制遣返。因此战俘营的斗争注定是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

反共战俘势力通过暴力斗争获得战俘营的控制权,建立起一套人身控制、暴力胁迫和思想灌输并用的制度。他们“用共产党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强制中共党团员和普通战俘参与反共活动。战俘营同样具有强制参与、无退出机制的特点,而拒绝服从的战俘只能通过冒险翻越铁丝网等极端方式逃离,或通过战俘营当局外力干预等特殊情况得以脱离。在反共战俘高压强制之下的“一颗心回台湾”又有多少志愿,多少强

135 陈永发《强迫与志愿的结合——评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二十一世纪》148期,2015年4月,第150页。

制,多少恐惧呢?

“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并非都是“志愿”选择去台湾的反共分子;“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非都是“志愿”参军去朝鲜保家卫国。同理,在“新中国的蜜月期”人民亦非都“由衷地”拥护共产党。

西哲云:“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¹³⁶。或可谓“若反对无自由,则支持无意义;若选择无自由,则‘志愿’当存疑”。

「新中国」からの脱走者——朝鮮戦争における 反共捕虜の生死をかけた逃亡の道筋、1950-1954年

要旨:朝鮮戦争は3年間続いたが、そのうち2年間は双方が戦いながら交渉も進めていた。停戦交渉の中心的な論点となったのは、中国人捕虜の送還の問題であった。アメリカは「任意送還」の原則をたてに一部の捕虜が中国大陸に戻らないことを認めるよう主張したが、中国共産党はこれに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たため、戦争はさらに約1年半伸びることとなった。中国人民義勇軍からの脱走者を中心とする反共捕虜は、早い時期から二つの主要な中国人捕虜収容所を支配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ほかの捕虜たちに対して身体的な拘束や暴力的な脅迫、思想的な教化をおこなった。その結果、1952年4月から5月にかけておこなわれた「選別調査」では、大多数の捕虜が送還に反対の意を示した。本論では、5名の反共捕虜リーダーの脱走過程を整理することで、彼らの様々な経歴が国共両党の統治のもとでそれぞれの思想と行動に与えた影響と、彼ら

136 法国十八世纪剧作家博马舍(Pierre Beaumarchais)在《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名言“Sans la liberté de blâmer, il n'est pas d'éloge flatteur”,后成为《费加罗报》的座右铭。

の脱走が戦局や戦争および捕虜収容所での闘争に与えた影響を分析する。そして最後に、「参加が強制され、逃れる仕組みがない」という制度の下で、個人が真に「志願」を表明できた可能性があったのかを検討する。主要な資料は、米軍の尋問記録、アメリカと台湾の軍事外交文書、捕虜の回顧録、個人檔案、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インタビュー記録である。

Defectors from the New China: The Perilous Escapes of Anti-Communist Prisoners in the Korean War

Abstract: The Korean War lasted for three years, but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s occupied two of those years. At the center of the deadlock was the repatriation of 21,000 Chinese prisoners, which included 14,000 allegedly anti-Communist prisoners refusing repatriation. A core of bona fide anti-Communist prisoners—mostly battlefield defectors—established their control in the two largest Chinese camps early on, persuading, pressuring, and coercing their fellow prisoners to renounce Communist China. This paper narrates the perilous escapes of five defectors who later became major prisoner leaders and analyzes how their divergent experiences under the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regimes shaped their ideologies and behaviors and how their defection influenced the outcomes of battles and prison struggl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voluntary decisions under political systems that involve forced participation and allow no exit.